

# “艾滋病”隐喻：入侵与污染

## ——基于一个艾滋病论坛的网络民族志研究

胡雨濛

**摘要：**对“艾滋病”的隐喻学理地奠定了这一疾病为人谈论的基调。在艾滋病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清晰可见各种话语相互博弈的痕迹。文章通过对一个艾滋病网上论坛的民族志研究，试图揭示艾滋病的双重隐喻谱系：像癌症一样“入侵”，像梅毒一样“污染”。研究发现，艾滋病的意涵十分丰富，既有科学知识领域以“客观性”为依据的概念建构，更有社会生活领域道德价值所提供的判断。艾滋病通过体液交换入侵人体防线，入侵的过程常被描述为战争，病毒既是敌人又是恶魔，只有坚强的抗争才值得赞赏。此外，病毒的感染途径被认为是龌龊的。由此，艾滋病带上了污染的隐喻——污染是病毒侵蚀身体的过程，也是病毒在人群间传递的方式，更是不检点的性态度对社会生活的腐蚀象征。这种隐喻谱系放大了艾滋病的社会危害，忽视了那些疾病的受难者，使得他们在忍受病痛折磨的同时还需要应付社会舆论的压力。

**关键词：**艾滋病；隐喻；话语；入侵；污染

**作者简介：**胡雨濛，女，博士生。（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6）03-0069-08

“艾滋病的建构过程，事实上是医学科学、权力关系、价值取向、社会体制等相互作用的过程。”<sup>[1]</sup>现代医学努力将“艾滋病”还原为一种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免疫缺陷状态；但在生活世界中，科学精神远不如道德判断有影响力；于是，科学话语让位于政治力量、媒体舆论、民间言谈——有时甚至沦为帮凶。“艾滋病”被赋予了诸多带有价值判断的意涵，被建构为面目可憎的“人民公敌”。

当然，艾滋病并非特例，当我们谈论任何一种疾病时，我们都不是从实验室的角度来谈论致病原因和机体应答，而是在各种社会结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的浸润下建构疾病。严格说来，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根本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而是对一种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命名。然而，当大部分人还对这一疾病缺乏起码的认知时，社会却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对艾滋病的形象产制、话语建构和文化心理。

Sontag 这样形容艾滋病：像癌症一样“入侵”，却又像梅毒一样“污染”。<sup>[2]</sup>其时，该病席卷世界的步伐刚刚开始，医学界直到 1986 年才确认其致病病毒并命名为 HIV，世人大多不甚了了。Sontag 将之比作癌症、梅毒，诚然简洁明了地解释了艾滋病的关键信息，却也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艾滋病的双重隐喻谱系。

这正是学界对疾病的建构——通过隐喻的方式。Sontag 虽然一直致力于破除隐喻的魔咒，呼唤以疾病的本来面目作为学理的建构逻辑，但她很乐意先通过这样两个看似十分自然和精妙的隐喻来以儆效尤。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一个网络论坛的民族志研究，观照社区中无奈的诉说、愤懑的抱怨、乐观的表态或理智的分析，结合艾滋病相关的公共言谈和社会现象，讨论主流话语产制下的“艾滋病”

隐喻。

## 一、疾病的隐喻

隐喻 (metaphor) 是指用一种事物来谈论另一事物。当它被语言学家挖掘出来, 赋予其超出修辞领域的含义时, 它成为一种广泛存在于思维、行动、日常生活中的映射关系。<sup>[3]</sup> 显而易见的, 隐喻是一种狡猾的策略: 它可以事半功倍地描述新事物, 也可以悄无声息地传达话语倾向。它的聪明之处在于, 它不像呼喊口号那么让人警惕和反感, 它不着痕迹地建构了概念, 在标示话语模式方面大获全胜。

在健康领域, 隐喻泛滥成灾。尤其是当一种疾病在流行之初, 社会对其缺乏足够的认知, 或者无从治疗时, 这种疾病的内涵会膨胀、蔓延四溢、冲毁篱墙。疾病原属于生理学, 医学界或将之称为“诸器官的反叛”, 健康则被认为是“诸器官的平静状态”。<sup>[2](41)</sup> 然而, 疾病常常以隐喻化的面目被谈论。当我们说疾病的隐喻时, 包含了两层含义: 以隐喻的方式谈论疾病, 又将疾病作为一种隐喻。在这个意义上, 新媒体中频繁出现的“懒癌”等词汇, 无不是将“癌”这种病理学上的变态反应和生理学上的疾病作为一种“无可救药”的语义来使用。也许, 这是“癌”这一字眼如此怵目惊心的原因, 除了其可怕的致命性之外, 还在于其反复的隐喻意义, 诸如德行的亏损、上天的惩罚、死亡的判决。Sontag 断定隐喻和神话能够置人于死地, 因为“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 ……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去寻求治疗, 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sup>[2](88)</sup>。

除此之外, 疾病隐喻化的另一个后果是患病者及其亲属难以名状的羞耻感。“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 那大多数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 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sup>[2](7)</sup>。在一些关于健康与道德关系的命题中, 健康常常被当作是道德的外化和映射, 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黄帝内经》中有“道德稍衰, 邪气时至”之说, 认为道德沦衰会引起气血不畅身体不健; 更有人直接论证了“善行与健康, 恶行与疾病之间所存在的因果性”<sup>[4]</sup>。这些观点是荒谬而又危险的, 但它却又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Foucault 在《疯癫与文明》中讲述了关于麻风病的社会意义: “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 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存留得更长久, 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 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 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sup>[5]</sup>”。Sontag 谈到了疾病的政治隐喻和军事隐喻, 即将疾病看作是一种“麻烦的公民身份”, 又当作是“现代战争的敌人”。<sup>[2](88)</sup> 杨念群的《再造病人》探讨了晚清以来中国人的“东亚病夫”这一被历史所建构的隐喻。<sup>[6]</sup> 凡此种种, 学者早已对疾病的隐喻给予充分观照。当 Sontag 野心勃勃地呼吁要将疾病从各种隐喻意义的限制中释放出来时, Brandt 不屑一顾, 他认为疾病给人带来了脆弱和死亡, 因此被赋予情感和社会价值, 正因为此, 疾病的社会建构是不可避免的;<sup>[7]</sup> Larson 等人更现实地指出, 面对不了解医学知识的门外汉, 隐喻是宣传疾病知识所必须依赖的武器。<sup>[8]</sup>

## 二、研究方法: “知艾家园”的网络民族志

互联网催生了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结构, 传统民族志难以胜任对赛博空间的考察。为应对虚拟环境带来的挑战, 网络民族志淡入研究者的视野。Hine 认为, 网络民族志“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针对网络及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sup>[9]</sup>; 卜玉梅总结关于网络民族志的中西方研究之后认为, “它是以网络虚拟环境作为主要的研究背景, 利用互联网的表达平台和互动工具来收集资料, 以探究和阐释互联网及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方法<sup>[10]</sup>”。

在传统语境下, 艾滋病患者作为边缘群体往往对自己的病情三缄其口, “无法表述自己, 只能被别人表述”<sup>[11]</sup>。但网络空间让原本隐匿在各个社区中的感染者自发地聚集到一起, 赋予了参与者“为自

己代言”的权利，将“我”的体验和生活的碎片主动呈现，一方面进行互助交流，另一方面就艾滋病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话语抗争。

“知艾家园”(<http://www.120x.net/>)是国内一个相对人数密集、互动频繁、组织完善的艾滋病交流的论坛。截止2016年1月1日，已有帖子94万余条，注册会员18万余人，此外还有许多没有常驻论坛的、仅限于浏览的“游客”。与传统的艾滋病社区相比，这一虚拟社区可以算规模庞大。论坛分为“新人帮助”、“艾滋交流”、“关爱同志”、“论坛建设”等板块，成员在其中进行自我表露、描述患病前后的生命体验，他们在网络空间的活动有着不同于现实空间中那些弱势者的行为特征，可能更真诚、更坦率，更愿意自我表露，交流更平等，观点表达更充分。

本文以“知艾论坛”为研究对象，通过论坛为期半年的虚拟民族志，考察论坛成员带有隐喻色彩的话语实践。一方面，这种民族志的方式是一种不现身的理解，即在他人没有“在场”时，通过观察和理解他人遗留下来的符号来参与社区，一切原始资料都对研究者开放；另一方面，民族志意味着超越单纯的文本分析，而通过与研究对象频繁的互动——对发帖人的访谈——来考察话语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

### 三、深入感染者话语的艾滋病隐喻

在历史的长廊里，麻风病、肺结核、癌症都曾被赋予过广泛的隐喻性。但是，到目前为止，恐怕再没有一种疾病，像艾滋病那样意涵丰富——冲决一切民族、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藩篱，席卷全球。Sontag专门在疾病的隐喻后补充了一篇艾滋病的隐喻，用以讨论附着在艾滋病之上的独特的隐喻特征。

在艾滋病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清晰可见各种话语相互博弈的痕迹。在科学知识领域，也许现代医学取得了胜利——以“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为基础建构了艾滋病的概念体系；但在社会生活领域，显然道德价值提供了更有力的判断。

“知艾家园”的成员几乎都是艾滋病的受害者和假想受害者，他们在论坛里或详或略地诉说他们的患病故事，言语之间常常流露出他们对艾滋病的认知——这些认知的形成，无疑有患病体验的掺和，却也免不了社会舆论的灌输，并且当主流话语倾注进个人感知之后，浇铸出的是更深刻入骨的艾滋体验。

9月25日下午四时，准时抵达疾控中心看结果，显示结果HIV初筛阳性。……这基本上宣判了我的死刑，只不过缓期几年而已。

抱怨不公平!？有多少人放荡成性，而你即便是性生活检点，偶尔的放纵依然可以让你抱恨终身。(2\*8)

他们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个比喻：HIV阳性的检测结果等于一纸死缓的判决书。这就是世人眼里的艾滋病——感染HIV者必死无疑，个人毫无还手之力，只能静待时间的消逝、死神的来临。另外，判决书还有另一层隐喻：罪犯为何会被判刑，因为他们犯了罪，罪无可赦；当人们将HIV阳性看作是一种宣判时，就意味着感染者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放荡成性”、“性生活不检点”、“放纵”而受到死刑的惩处——只不过判决的权力由法律让渡给了医学。

Sontag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疾病的隐喻会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使得患者认定“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sup>[2](44)</sup>。在这样一种社会语境下，患者和病毒携带者遭受污蔑、刁难，甚至众叛亲离；他们是不幸者、受难者，但很难被纯粹地同情、毫无芥蒂地援助。或多或少，外界对这个群体会加以一个极具嘲讽的评价：自作自受——对疾病的怜悯和对越轨的嫌恶交织在一起。

当一种疾病成为隐喻后，它会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被用于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交流语境。

今天,我和一个朋友交谈,谈论到某事情的时候,大家有各自的意见,相持不下。

最后我说了句:这事你要听我的,要是我错了,我就染艾滋……

朋友吸了口冷气道:发这么毒的誓?好吧!我听你的。(香\*\*系)

发誓是一种言之凿凿的语汇,表示“此言当真,不然我就受到命运的重创”,以此取信他人,其说话规则大略都是“事实+事实未达成的下场”,下场重者如天打雷劈,轻者如吃泡面没有调料包之类的玩笑。染艾滋被当作毒誓,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不得好死;它作为一种下场具有如此强的信服力,表现了人人避之不及的恐惧与嫌恶。旁观者将染艾滋当成诅咒,带有一些调笑的意味;但对身处艾滋漩涡的人而言,却成为一生都无法逃开的沉疴。

像其他一些引起患者羞耻感的疾病一样,艾滋病常常是一个秘密。讽刺的是,当某人被诊断为癌症时,他的家人常常向他隐瞒结果;但当一个人被诊断为艾滋时,本人很多时候是第一个甚至是除医生外唯一的知情者,他要经常考虑是否向家人朋友表露的问题。在“知艾家园”里,很多感染者会讨论是否将患病事实告知父母、如何告知以及告知之后的反应。他们担心父母难以接受,一则子女陷入死亡的沼泽,二则子女竟怀揣如此令人羞惭的秘密——放荡以致身染重病。

一开始我对这病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那些可怖的宣传画上,所以在从疾控医生口中听到消息时,以为要从顶戴各色美好光环的优质小青年沦落到人人敬而远之的垂死怪物,恐惧与彷徨一下占满了全部。(另\*\*角)

这可能就是大多感染者的心态:“小时候可怖的宣传画”奠定了他们对艾滋病的认知基础——同时这也是主流话语建构艾滋病的方式,以可怖的形象警醒受众;从“顶戴各色美好光环的优质小青年”向“人人敬而远之的垂死怪物”的转变,让人觉得难以承受,因为在人们的认知里,一旦患病,他已经不再是“正常的人”,而成为了“怪物”。因为害怕“人人敬而远之”,所以患者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启齿,无法与亲友分享患病的细节、诉说病痛的苦闷,博人同情、受人援手。

昨天晚上大家忽然聊起了艾滋病,搞得我在旁边有点不知所措。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大声地对他们说:“嘿,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个病吗,你看我都活了几十年了,还不是好好的。”我希望有这一天的到来,虽然是那么漫长与无奈。(如\*\*烟)

可悲之处在于,在目前的社会语境下,艾滋“不只是个病”,加诸“艾滋”和“HIV”之上深厚的隐喻,让感染者只能躲藏于人后,不敢在光天化日为它辩说一二。

“死亡——确切地说是对死亡的禁忌,已成为话语的一部分,这些话语在公众社会联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以学院‘权威言论’的地位影响着社会各界。<sup>[12]</sup>”所以,即使在论坛中,感染者之间以虚拟身份交流时,一些人也会对“艾滋”字眼讳莫如深,他们用“那个”等字眼来代替:“不会是那个吧”。一旦提到艾滋,重重叠叠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就扑面而来,因此他们宁愿认同社会惯习,将之作为一种禁忌,毕竟死亡是不可轻易提及的事情,尤其是不体面的死亡。

当我们言说“艾滋病”的时候很少区分患者和感染者。但其实,从HIV感染者到艾滋病患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HIV侵入人体后,并没有很快侵蚀免疫系统,感染者的CD4细胞仍然可以一如常人;随着CD4细胞的逐渐下降,低于一个医学认定的危险标准后(目前国内大部分省市的疾控中心认为是350),病人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并在产生耐药之后更换药物;直到无药可治,免疫系统被病毒摧毁殆尽,感染者才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艾滋病患者,并容易死于各种机会感染。所以,一开始,当感染者拿到阳性检测单时,他们本身其实并没有太强烈的躯体症状(或只有短期的感染不适,之后会进入潜伏期),所有患病的感知可能只是检测单上躯体生理指标的偏离。但是,医学话语的力量在于,它可以在生理机能尚未有所察觉的时候,就用阳性和数字为一个人进行命名。

1—2个月的检测已是我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了。刚开始的时候,每到拿检测报告的前一



天，总是忐忑不安。每一次的检测报告就像一把尺子，它量的是我和死神之间的距离。

记得有一次，当我拿到检测报告的时候，我几乎站不住了。仅仅1个月，我的CD4细胞计数下降了400，只剩下300多了。正常人的CD4细胞计数为700-1500，而一个HIV携带者正常情况下，每一年才下降20-30。那时，我真的感受到死神像饥饿凶残的猛兽一样，觊觎着一顿美食发出的按捺不住的喘息声。（黎家明）

诚如这位在“知艾家园”里，甚至艾滋病界都出名的成员（当然，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化名）所描述的：每次检测报告就像一把尺子，测量与死神的距离。在论坛中，几乎所有的感染者在自我介绍时都会提到自己的CD4细胞数，仿佛它是一个标签，一个跟年龄、身高一样重要的数据。他们汲汲于CD4的细微变化，并且羡慕那些细胞数高的感染者，同情和帮助细胞数已经快要跌破谷底的感染者。当细胞数下降的时候，“死神像饥饿凶残的猛兽”一般，令人胆战心惊。

Sontag在她那个时代说“艾滋病无药可治，只能以缓和剂来苟延残喘”<sup>[2](109)</sup>。然而，二十余年过去了，差别只在于缓和剂种类更多、价格更低廉，医学使生命愈加数据化，艾滋病“无药可治”的事实仍没有改变，给人带来的医学命名早于身体感知，社会性死亡早于身体性死亡。

那么，艾滋病是怎样完成隐喻的呢？与其亲密接触的感染者又是如何呈现自我感知和社会建构的疾病认知的呢？再次，我们不得不提到Sontag，不得不感叹她的“像癌症一样‘入侵’，像梅毒一样‘污染’”的隐喻实在是精妙。艾滋病通过体液交换入侵人体防线，随后寄居在体内等待占领新的领地；而占领的方式是人们所鄙夷的，造成了污染。以下，我们将详细地审视艾滋病的这两种学理建构方式：入侵隐喻和污染隐喻。

#### 四、入侵隐喻：敌人、恶魔与抗争

我有一个对手，它无比强大。

每一天它在这个星球上要杀死近3000个人。二十几年来，它已经杀了2200多万的人，还有4000多万人已经在它的魔爪中等待死亡随时的降临。人类至今无法消灭它。它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具毁灭性的灾难——艾滋病！

——黎家明《最后的宣战》

黎家明是艾滋病界的名人，他感染HIV之后，将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写成了文字，在“榕树下”连载。这篇被广泛转载的纪实文学，题目叫作《最后的宣战》。

为什么要宣战呢？黎家明说：艾滋病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敌人已经入侵，战斗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疾病作为不义的代言者，常常被视为一种敌对势力。Sontag谈到疾病可以表现为“军事的隐喻”：“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sup>[2](88)</sup>人们常常把健康的身体视为自我，疾病则是存在于身体内部和外部的异己之物。当它进入身体，占领某些系统或器官，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入侵者和敌人——我们要么选择打败它，要么走向灭亡。

病毒的入侵发生在显微镜意义下，肉眼自然无法目睹。但是，这不能阻止人们对其进行想象，栩栩如生地描述可怕的侵略行径。

数年前，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我的女朋友传给我一份致命的病毒拷贝，在我体内欣欣向荣繁衍，任意占据我的身体。（香\*系）

在梦里，多少次都有这样的可怕场景出现：一群黑色的小点，像蚂蚁一样，1个变成2个，2个变成4个……它们成级数地疯狂复制，黑压压一片，手舞足蹈。贪婪地吞噬着我的肉体，发出越来越大的饕餮之声。慢慢地，我的身体被掏空了……（黎家明）

除了将艾滋病毒比作敌人外，他们更将之形容成恶魔——这是一种更疯狂更残暴的对手。敌人至少还是人，如果自身足够强大，兵精粮足，可能还能势均力敌，甚至克敌制胜；但将艾滋病比喻为恶魔的时候，它就已经丧失理性，只管肆虐屠杀。

病魔开始发威了，它首先扭曲的是我的心灵。我变得害怕和厌恶年轻的女孩子，与她们说话令我心悸。……刺心的肌肉跳疼，不时提醒我：那个恶魔开始享受它的大餐了。(s \* \* q)

当然，艾滋病从来不是个体的事情，对于社会而言，艾滋病毒的蔓延同样是一场入侵，战争的隐喻意味着若无有效的防御措施，社会之舟将行至危急存亡的关头。于是，主流话语将艾滋病防治工作隐喻为“‘抗击艾滋’、‘艾滋病战役’，公共卫生系统每年更新‘死亡人数’与‘新感染人数’，以提醒人们‘艾滋战役’的日益残酷”<sup>[13]</sup>。

既然艾滋是一场入侵，那么，不管是缴械投降者——受不了重压而自杀或放任自己堕落的感染者，还是叛变投敌者——为报复社会而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的感染者，都是被鄙视和唾弃的；唯有坚强的抗争值得赞赏。与疾病抗争，不被它击倒，克服它带来的不幸，这在疾病叙事中一直是被称颂的精神。“那些饱受慢病折磨的人尤其希望重振自身与疾病抗争的意义与力量。”<sup>[14]</sup>在普世价值的眼光里，疾病面前最能反映一个人的道德高下。即使战斗注定了是以死亡告终，但是，以乐观的心态与敌人作殊死搏斗，是对之前失德染病的弥补，也是论坛中感染者互相激励的擂鼓与烽烟。

因此，在论坛中，让感染者引以为豪是他们与 HIV 不死不休的斗争故事，和未被击垮的求生意志与向善之心。乐观者充满浓浓的战斗之情的话语往往会得到鼓励和赞美，很多时候，这些誓言是悲壮的，带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和看淡生死的坦然；感染者以这样的话语，来将自己建构为末日的英雄。

人的一生有很多场战争，但此时此刻应该是人生最后的战役！而我们就是一线的战士。……不管能不能亲眼看到这场战争的胜利，至少我们能战胜自己就不枉此生！（暖 \* \* 生）

目前正在我的身体里疯狂复制的病毒，无论它多么邪恶和诡秘，它必将葬身在我的身体里，我年轻的身体就是它们最后的坟墓！现在我是对它无能为力，但最终我是他们的终结者。（万 \* \* 复）

## 五、污染隐喻：传播途径与道德偏向

因为自己曾经做过肮脏的事情，就觉得自己特别的脏。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一刻我的灵魂在哪里？！它是不是和死神去约会了呢？！

我现在的内衣和内裤都是白色的，自己在洗澡、洗床单和衣服的时候，总是一遍又一遍，喜欢清水流过身体的感觉，真想它可以冲洗掉身上的 HIV 和曾有过的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

——黎家明《最后的宣战》

“脏”，这是一个常被用于形容与艾滋病相关的人、事、物的字眼：感染途径是齷齪的，感染者是肮脏的，身体是不干净的，病毒是亟需被冲洗的。由此，艾滋病带上了污染和异变的隐喻——污染是病毒侵蚀身体的过程，也是病毒在人群间传递的方式，更是败坏的道德和不检点的性态度对社会生活的腐蚀象征。

艾滋病常被描述成为“来自身体外部的传染物”，但当它占领了一个宿主之后，人体也成为一個充满污染的容器。

我的人生道路硬生生扭转了一个方向。本来是漫长的万米长跑，忽然变成了百米速跑，跑道还布满了铁钉、荆棘、陷阱、玻璃渣、毒蛇、噬人丧尸、野兽夹、地雷……

我吃着廉价快餐竖起大拇指说：怕什么地沟油防腐剂三聚氰胺，我们才是身体充满毒素的

王者。(香\*\*系)

感染者用“充满毒素的王者”来形容自己，身体已被艾滋病毒所沾染，因而无须再精心养护，也无须小心提防其它毒物。在这些话语中，艾滋病成为了人生中最大的污染源，带来的不仅仅是体质脆弱，还有污浊、泥淖、腐烂。

除此之外，艾滋病的污染更是道德的污染。诚然，当社会普遍将艾滋病道德化时，它的确能起到一定的规约效果。它告诫人们洁身自好，忠于性伴侣，远离性放纵和其它恶习（如吸毒）。“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起了预防作用，它变成了精神卫士，代替国王派来看守的弓箭手，制止引起破产的放纵行为。”<sup>[15]</sup>由此，社会道德图式以污染之名完成了它的统治。

问题是，为什么单单是艾滋病会有如此深重的污染隐喻呢？若论它对健康的危害，虽然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艾滋病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但从感染到致命会有一段平和稳定的时间，远不如一些烈性的疾病；若论它对社会的影响，HIV的传染性自然不如藉由空气传播的病毒那么残忍。有些人说，艾滋病“生活方式病”的特征是其为人不齿的缘由，但目前看来，这样的论断依然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很多现代社会中的疾病同样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如抽烟喝酒的嗜好、高盐多油的饮食习惯，但它们并未受到道德过多的指责。

Sontag提到艾滋病的污染隐喻时用了个修饰语：像梅毒一样。那么，梅毒和艾滋病有什么共同点？虽然前者经过系统治疗可以痊愈，后者至今仍是不治之症，但它们的传播途径中都有一条主要的令人羞耻的渠道：性传播。

很多绝症——诸如癌症——的患者常常抱怨命运的不公，认为是身体背叛了自己。他们会苦涩地问：为什么是我？但艾滋病毒感染者连宣之于口的资格都没有，艾滋病并不是一种随意攻击的病痛，为什么感染，他们心知肚明。与其抱怨，还不如忏悔。

与艾滋病一样，梅毒也是一种声名狼藉的病灾。医生往往不需要询问经过就可推断感染梅毒的原因：与梅毒携带者发生性关系所致。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虽然不止于性传播，然而，正如Sontag所说：“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责——尤其是当艾滋病不仅被认为是性放纵带来的一种疾病，而且是性倒错带来的一种疾病。”<sup>[2](102)</sup>与不洁性行为相挂钩，是艾滋病污染隐喻的主要指向，血液与体液成为了污染载体。

性行为绝不只是一种现时体验：它要为未来负责——意味着可能孕育生命；也要与过去挂钩——与一个人交媾的同时，也相当于与其过去的性伙伴发生性关系，一旦链条中的任何一环被感染上性传播疾病，链条上的所有人都有危险。避孕套的出现大大减弱了性行为与未来和过去的关联性，然而却并不十分稳妥。艾滋病的感染案例往往揭示这样一个道理，除长期稳定的性关系外，其他所有性关系都是危险的，带有污染性质的，也是可能受到疾病的惩罚的。

## 六、结 语

艾滋病绝非只是一种医学疾病，现实语境下被谈论的艾滋病充满了政治和文化意味，包括传染性，与越轨有关的种种联想，以及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污损。在互联网语境下，拥有“自我表述”渠道的感染者们呈现了这些他们体会到的社会偏见。

不可否认，一些感染者的患病的确有部分个体的责任，并且艾滋病的确能起到对社会的“规约”效果。问题是，对艾滋病的入侵和污染隐喻普遍放大了这一疾病的社会危害性，忽视了那些疾病的受难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遭受污蔑、刁难，甚至众叛亲离；他们很难被纯粹地同情、毫无芥蒂地援助。

疾病的隐喻带来的是对患病者的污名化。他们一面忍受病痛带来的折磨——这是可以为药物控制的；一面承受社会舆论若隐若现的指责——也许，这才是艾滋病最可怕的敌人。

## 参考文献:

- [1] 张晓虎. 艾滋病问题的双向建构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10.
- [2] Sontag S. 疾病的隐喻 [M]. 程巍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94.
- [3]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9.
- [4] 邹成效. 论疾病与道德的关系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1998 (4): 38.
- [5] Foucault M. 疯癫与文明: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M]. 刘北城, 杨远婴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3-4.
- [6] 杨念群. 再造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1832-1985)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7] Brandt A M. AIDS and Metaphor: Toward the Social Meaning of Epidemic Disease [J]. *Social Research*, 1988, 55 (3), 413-432.
- [8] Larson B M H, Nerlich B, Wallis P. Metaphors and Biorisks The War on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nvasive Species [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5, 26 (3): 243-268.
- [9] Hine C. *Virtual Ethnography* [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0: 65.
- [10] 卜玉梅. 虚拟民族志: 田野、方法与伦理 [J]. 社会学研究, 2012 (6): 220.
- [11] Said E W. *Orientalism*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3: 1.
- [12] Chlada M, Dembowski G. 福柯的迷宫 [M]. 朱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47.
- [13] 张有春. 污名与艾滋病话语在中国 [J]. 社会科学, 2011 (4): 91.
- [14] Blaxter M. 健康是什么? [M]. 王一方, 徐凌云译.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87.
- [15] 孙雯波, 胡凯. 疾病的隐喻与疾病道德化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6): 44.

[责任编辑: 赵晓兰]